

## 1. 血 债

我们出生于 20 世纪初期这一辈的人，给 21 世纪的青年人能留下什么遗产呢？最重要不过的，应该是我们老一辈切身体会到没有国就没有家的惨痛教训吧！

我们儿时在小学受教育最深刻的四个大字是“毋忘国耻”。每年有多次使儿童心境十分压抑的国耻纪念日，尤其是在 5 月。首先，五九国耻是指 1915 年 5 月 9 日，当时作为总统的袁世凯竟然承认日本政府提出的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款。其次，五卅惨案的血债是指 1925 年 5 月 30 日，英国巡捕开枪打死在上海南京路抗议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示威群众十余人，伤者无数。最后，五三惨案的血债是指 1928 年 5 月 3 日，北伐军进抵山东时，日本军队侵占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 5000 余人，中国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鼻，最后和中国十六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每逢这些日子，老师给我们在袖子上缠上黑纱志哀，教导我们说：“知耻近乎勇，有勇有谋，你们长大了一定要雪耻，清算英、日、俄、法、美等国强加于我们的耻辱。”但是，到我们长大了，不但国耻未雪，反而旧恨新仇接连而来，我们这一辈人尝尽了国破家亡的大灾难长达 14 年之久。

今天，中国青年有幸，活在雪了耻的年代。 1995 年是

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到底，赢得胜利 50 周年的大庆，公祭抗战英灵的日子。1997 年是中国收回香港之年，也是告慰林公则徐等先烈的日子。在中国灾难深重中幸存至今的老年人，终能看见中国雪耻消恨，也是一生之幸。但是庆幸之余，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根据个人的经历，把惨痛的历史教训一代代传下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民族悲剧才不致重演。

回忆过去，首先想到在日军铁蹄下受尽蹂躏 14 年的东北三省；想到 1932 年日阀侵犯淞沪，闸北人民在日本陆海空三军的炮火下家破人亡的惨剧；想到在日本兽兵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下，华北各地农村人民遭受国破家亡的灾难；想到南京大屠杀死于日兵刀下的男女老少；想到日机滥炸重庆等城市，居民死伤无数……想到这一切，我个人的遭遇就算不得什么了。但是有二三事，是现代青年知之不多，而却是我身历其境的，应该记录下来，传之后代。

在广州的珠江之滨，有个由河沙冲积而成的小岛叫做沙面。在 1842 年鸦片战争之前，英商买通清朝昏官占用沙面，作为他们贩卖鸦片和经济侵略的“跳板”。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竟视沙面为其领土，设驻军警，“闲杂华人”不准入内，并声称“为了保护沙面英侨”，派炮舰常停在珠江河上，中国船只不得靠近。美国为虎作伥，也常驻炮舰在河道上。然而，清朝昏官却处之泰然，丧权辱国到这个地步。但是，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不止于此。

1925 年 6 月 23 日，广州 10 万人游行示威，抗议英国巡捕枪杀上海民众。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男女

老少在市内各处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收回租界！”等口号。队伍行经与沙面一水之隔的沙基大街（后改称为六二三路），埋伏在沙面的英国军警突然开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 50 余人，重伤 170 人；入侵珠江河面的英舰并向广州市内开炮示威。但是，英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新旧血债，掀起中国声势更壮大的反帝斗争，扩大了 6 月 19 日开始的香港工人抗议五卅惨案的大罢工。华籍海员、运输工人、汽车司机、清洁工人等带头斗争，罢工人数达到 25 万，并且有十多万工人离港回广州。香港经济本以转口贸易为主，工人大罢工使香港水陆交通陷入瘫痪状态，损失重大。广州沙面原在英、美、日、法等洋行工作的民众也加入大罢工队伍，并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广东沿岸各海口的交通，断绝大陆给香港的供应。沙面更是孤立无援，犹如瓮中之鳖，英国军警龟缩在通往沙基大街的东西两桥之内，不敢露面。桥外在沙基这一边，烈士的鲜血激发起学生们更强烈的斗争精神，全力协助工人抗争。省港大罢工坚持到 1926 年 10 月，历时 16 个月。帝国主义第一次体会到中国人民组织最严密，参加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反帝斗争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当时，广州市民常讲的一个话题是：英国人在我们反击下为什么不敢再开枪了？军舰为什么不敢再开炮了？我们是从省港大罢工，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在团结起来的广大群众面前，原来是只纸老虎。这是省港大罢工的一大收获。但是，我们并没有获得全胜。16 个月之后，香港还是往日的香港——英帝国的殖民地；沙面还是英法的租界。政府并没有

取消不平等条约，没有取消租界。为什么？

只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而没有坚定的革命政府领导，那是打不倒帝国主义的。1842年广州近郊三元里的爱国群众首先在鲜血中发现这条真理。90年后，国民党政府迫使坚守闸北阵地、抵抗日寇入侵的十九路军撤退一事，是继省港大罢工、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后，再一次证明政府与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才能雪耻，才能迫使帝国主义偿还血债。

1931年9月笔者满怀希望北上，进燕京大学读书，不料刚到北平就国难临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挑衅，不到半年就侵占了东北三省，奴役3000万东北人民，并进窥内蒙古和热河省。土地狭小、资源缺乏的日本，为什么竟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侵占了比它自己的面积大几倍的中国领土呢？难道日本当时强大无比，不可抵抗吗？不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当时衰弱混乱到可耻的地步。所谓“人必自侮而人侮之，国必自伐而人伐之”。这句警句足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国耻悲剧，也是后代切不可忘记的。

当代青年同胞大概想像不出“九一八”之后，在抗日前线的热河省，混乱衰弱到什么程度。笔者亲眼看见的情况，可悲可泣，记录下来让后人引以为戒。

1933年1月，燕京大学抗日后援会派遣热河工作队一行17人，利用寒假到热河抗日义勇军部队工作。我们穿过长城的古北口，经承德、平泉（今划归河北省）、凌源（今在辽宁省）、下洼、大沁塔拉、兴隆地到达开鲁等地（今均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所经各处我们宣传抗日，并访问

当地军民。月底回校后，我整理了日记，发表在同年 3 月份的《燕京新闻》，其中有历史价值的内容，现分述如下：

当时（1933 年 1 月）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正在从辽西入侵热河，进犯河北省。热河是保卫河北必守之地，中国理应派重兵防守。但事实上，平泉一线只有万福麟的一个旅和汤玉麟的一个团的老弱残兵。蒋介石拥兵百万，却没有派一兵一卒到热河前线。汤玉麟身为热河省长，他的队伍却最无纪律。我们在平泉市上听说汤的队伍扰民。我悄悄地问小客栈老板：“为什么正规军也扰民？”他回答说：“老汤一年只发半个月饷，兵士吃啥？”

开鲁是国军面对辽西日寇的前线，我们进开鲁城那天，敌机刚轰炸城内民房，被炸的房子还在冒烟，城门内外没有哨兵值勤，大街上士兵和居民惊惶失措，盲目乱跑。我们问一个士兵，驻军有放枪打敌机没有？他回答说：“打什么！我们只有步枪。上面下令，由于缺子弹，没有命令不得放枪。凡擅自放枪的，每颗子弹要赔两毛钱。我们当兵的有谁赔得起！”（这两毛钱指北平的毛票，当时一角北平毛票在热河值热河票四元。）

国民党政府亲日派，一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求和，在热河可以说是没有设防。我们期望在义勇军中看见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当时，在热河的义勇军是民间抗日的武装组织，得不到政府的军饷，一切给养“来

自民间”。这次与我们同来的辽吉黑抗日后援会办事人员运来了棉衣和钞票，准备发饷。但这些给养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慰问过七支义勇军，其中有独立第一支队副司令方范的队伍、第七军团第三梯队七支队司令孙震甲的队伍、驻扎在下洼城东的冯占海部、驻扎在大沁塔拉的姚秉乾的骑兵，并且和后援会请来在内曼蒙旗维持治安的第九旅的刘连长和开鲁的稽查处处长，谈论各地义勇军的情况。

热河义勇军的官兵来自各方。例如，方范副司令是来自关内。1927年，他东渡日本进陆军士官学校。1930年和翁照垣（后为十九路军将领之一）赴法国进入航空学校。1932年1月日寇在上海启衅，方氏参加闸北保卫战。停战后回山东探望双亲，父母催他成家，他不肯从命，北来热河前线参加抗日。方副司令告诉我们，义勇军最大的困难是给养和弹药两大事。民众抗日后援会成立后，给养问题可望逐步解决，但弹药仍然很缺。目前他率领的士兵没有一门炮，步枪子弹平均每人只有二三十发。

方范告诉我们，投奔义勇军的士兵动机各有不同，有出于爱国心，有出于生活无着，也有想升官发财的。因此他练兵的重点是加强思想教育。他说：“义勇军中确有一部分是扰民的，以致本地老百姓一见穿灰色制服的人就头痛。这样糟，怎能对外？因此，我们除教育士兵之外，同时也要向老百姓做工作，使军民团结起来抗日。”

在我们慰问的义勇军中，方副司令的部队比较整齐，每天练兵也比较严格，可惜缺乏武器，战斗力是有限的。

第七军团第三梯队第七支队司令孙震甲本属东北军第七旅，驻扎在北平西郊时，是燕大学生马术团的教官。当时他曾告诉我们，他要到关外投义勇军抗日去。如今我们在凌源重逢，十分兴奋。他带兵的方法是少见的：每个士兵的制服上缝个号数，并在他的家属的大门牌上钉上同样的号数。他解释说，这办法的作用有四：一、他手下的士兵以前大多是有前科的胡匪，军警见到他们会追捕的，如今制服上有司令部发的号数，知道他们已弃暗投明，就不咎既往了。二、士兵如去扰民，老百姓向司令部按其号数告发，一定严惩。三、士兵如有犯法在逃，司令部可按号数和门牌追查。四、如有阵亡，烈属可按门牌号数领抚恤金。孙司令带兵的办法与方范司令着重思想教育的迥然不同，可见义勇军中各支队的素质良莠不齐，打起仗来，步伐难得一致。

在热河的义勇军一共有多少人？谁都不知道。提供给养的辽吉黑后援会也无确数。驻扎在下洼城东的冯占海部的卫队团的第一、第二两连的人数不过四五十人，并且大多是中年人。按编制一连应有120人。一位连长解释说：“人还没来齐，有许多请假外出。”冯部本来是吉林军，士兵多是吉林人，在热河没有家。“请假外出”不会是回家的。这句话只有两个不宜明说

的含义：一是队里空额不少，以虚报人数来多领给养是义勇军中的公开秘密；二是有些士兵确实是请假外出去搞点“外快”——向老百姓要东西的婉转语。

比扰民更严重的问题是内部不团结。在内曼蒙旗维持治安的刘连长，告诉我们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上月姚部某连被十个胡匪架走了两挺重机枪。后来我连把那些胡匪包围了，才把枪夺回来。姚部那个连听说我们夺回来了，成群结队把这座房子包围起来，大喊大叫说，要是不立刻把枪交还他们，就要就把我们解决了。我没说过不还。把枪还了给他们。只怕哪一天胡子又来抢走了。”

在开鲁的第九旅的稽查处处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兵，1894年中日之战的平壤之役被俘；1905年日俄之战时，他集合一些人缴获俄军残部的军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德争夺青岛之役，他恰巧在青岛，暗中帮助德军，以报在平壤被俘之仇。谈到义勇军，他叹息说：“义勇军组织松懈，训练不严。成千上万人去攻打通辽的日军，敌军守城的只有几百人，却久攻不下。你看开鲁这个小城竟有九个司令部。他们不但不合作，反而明争暗斗。十天前崔兴五旅与李海青的部队就开起火来了，为的是李部的马吃了崔部的草。可幸邓文旅长尽力调停，双方才鸣金收兵。唉！救中国还是要靠爱国青年，我老了，你们要争气啊！”

1933年1月23日，开鲁城中九个义勇军司令部被日机炸中了八个。24日天微亮，城里居民就扶老携幼

往城外跑，有猪的赶猪，有驴的赶驴。午前两架敌机肆虐，炸死一个老人和几只牛。25日却整天没有敌机来扰，早上也没有居民往城外跑。许多商店开门营业了。原来开鲁商会会长曾到通辽与日本人交涉，要求不轰炸城内民房，敌人答应以义勇军都撤到城外为条件。除崔旅外，义勇军从25日起都不在城内了。开鲁离通辽仅160里，汉奸来往频繁，敌人对开鲁城内情况了如指掌。

这就是1933年1月中国在热河省面对日军入侵的武装力量。

大敌当前，群众的力量本应是武装力量的后盾，但是当时热河的老百姓士气低沉，在省会承德也感觉不到有抗日救国的气氛。报纸和学校是全国各省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阵地。热河全省当时却没有一家报馆。学校捐是收了，但平泉镇只有一所公立的小学。老百姓不知国家大事，不闻不问，因为自顾不暇，求生存的压力太重了。大沁塔拉的耕地每亩只收一斗多高粱，一斗高粱值5角，而一亩地政府征捐5角。在汤玉麟省长治下，热河抽捐名目繁多，什么保甲捐、商店捐、商会捐、学校捐、户口捐、食粮捐等等。老乡生活很苦。我们汽车所过之地，跑出来看热闹的小孩子，大冬天都没有裤子穿。

除苛捐杂税之外，鸦片是热河一大祸患。平泉全县有耕地3500多顷，种罌粟的有1000多顷。镇上有

150 多家大烟馆，占全镇商店的一半。我们晚上到承德，到处找不到卖吃的，旅店只有鸦片烟和稀饭。到凌源，入县府，一阵阵大烟味扑面而来。84 年前，林公则徐把英商违反中国禁烟法偷运到广东的鸦片当众销毁，剩下的八袋运到北京展览，满以为留给后代看看英国人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证实物。林公怎会想到他的后辈大量生产鸦片，在热河到处可买，5 分钱一包，比大米便宜！林公有灵，能不痛心？当年他上书道光皇帝，请求严禁鸦片。他指出：“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原将无可用品之兵。”如今在热河，军、民、官员抽大烟有如吃饭，成为生活常事。但是，饭是钢，烟是毒，入人骨髓。“瘾君子”骨瘦如柴，意志消沉，毫无斗志。这样子，怎能保家卫国！

然而，热河大地上的人民，原来不是这样萎靡不振的。无论是汉族人还是蒙古族同胞都是以强悍著称的。18 世纪末，英国首次派来中国的公使马戛尔尼到承德行宫求见乾隆皇帝，英使看见清廷兵强马壮，不得不服从中国的要求，跪下来觐见皇帝。如今，1933 年 1 月，在承德上空高高飘扬着的却是一面英国国旗，英国领事馆人员深入到中国腹地，以推销哈德门香烟为借口，刺探国情，而贫穷的承德老百姓都以能为英国人干点活儿，挣块大洋为幸事。

大地没变，种族未变，而国运的一盛一衰，反差多么强烈！为什么？

1933年1月26日，我们百感交集告别开鲁同胞，动身南返北平。我们预料敌人早晚会从通辽进占开鲁，沿凌源、平泉一线入侵承德，威胁河北省。但总没有想到我们南返途中敌人已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力战，但国民党政府下令后撤，山海关就这样陷落了。接着，日伪军10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汤玉麟不战而逃。仅10天，热河全省陷入敌手。日军接着进攻长城各口，直接威胁北平和天津。二十九军不顾南京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奋力抗战，但国民党政府亲日派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中内容实际上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占有东北三省和热河，并划出绥远省东部、河北省北部和东部这一大片地区为日军享有自由出入之权。几千万民众就这样子被置于敌人铁蹄之下。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之始，国民党政府就声称“安内攘外”为其对策。但事实上这个政府是怎样“安内”的？我们在热河所见可以为证。热河前线告急时，独揽国家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只派去一个抽大烟、不管人民死活、猛抽苛捐杂税的汤玉麟，留下100万国防军在后方，对要求抗日救国的革命群众，进行多次所谓“围剿”，造成军民伤亡不计其数。

国民党政府是怎样“攘外”的？无休止的敌进我退直至大半个中国，从长白山到大西南，全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过半人口深受国破家亡的大灾难。

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是不容否认的，尽管到了今天，五六十年之后，还有人抵赖连侵略中国

这样明显的事实都不肯承认。血债累累，赖不了的。 20 世纪不认账，我们可以等待到 21 世纪，我们后继有人。

我们可以不先忙于清算血债，但是要加紧吸取血的教训：200 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外国人侵的灾难，这无不与历代政府的失败有关，它们独揽大权，却不是为民族前途和人民生活着想，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无不如此。它们为了保住个人，或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政党的统治地位，不惜“安外攘内”，给中华民族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

老百姓也失责。我们大多数人或沉睡，或盲从，或“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关心国家大事，使过去那些政府因此得以恣意妄为。如今，国运才开始好转，但是，要好转下去，单靠有政府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的人民对政府督促检查。后一条件我们今天完全具备了吗？

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全国解放了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苦呢？这岂不是与老百姓政治觉悟不高，分不清是非，有直接关系吗？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过去了，国家安定团结了，国际地位提高了，因此，有些青年认为国耻、国难和内乱都成为往事了，让老一辈人的经历和大道理随同 20 世纪进入历史博物馆吧。的确是这样！一切都要随着历史的长流而消逝。但是，谁能肯定，国耻、国难、内乱不会以不同的形式，在 21 世纪重复出现呢？

美国《新闻周刊》1994 年 8 月 1 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

《新殖民主义》。美刊认为，新殖民主义没有使用枪炮，也不大事声张，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比使用武力所能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美刊那篇文章写道：“……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在最弱的国家里，捐赠者的影响是最强大的。在被债务、贪污腐化和专制独裁所困扰的拉丁美洲，从墨西哥到阿根廷，各国都不得不在捐赠者的援助和压力之下，制定自己的经济方针。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银行家是新的霸王。东欧和前苏联的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已从党政官僚的怀抱落入西方顾问和政府官员的怀抱之中。……无论哪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要是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是不能指望存在下去的，因为它的批准能够确保得到外国的信贷、贸易和投资。”

有人指出，中国虽然身列第三世界，但是不应该和那些弱国相提并论了。对，中国不是最穷的。但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无一不向发达国家贷款，中国也不例外。

无论是捐赠或是贷款都是附带有条件的。捐赠者和贷出的一方，往往通过所签订的条件，来取得在经济、政治或文化上的利益。请看有关中国的一例：

日本《东京新闻》1994年7月20日的一则报道：  
……日本在十年前向中国提供了670亿日元的贷款，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456亿日元的贷款，两国从今年起开始进入偿还期。十年前的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换237日元，而现在

却是 1 美元兑换 98 日元，日元大幅度升值。这些非援助国由于要筹措十年前两倍以上的美元，并把美元换算成日元偿还债务，因而以美元标准计算的偿还日元贷款的负担就将大幅度增加。”

就今天世界富国之间，在军事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有谁敢肯定在今后二三十年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有谁能预知，一旦发生大战，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不会受到压力呢？

因此，我们行将过去的这一辈的老人，奉劝青年人要提高警惕看世界，不要像社会上一些人沉迷在个人发财与享受的生活中。

中国国内情况是好转了，但是并非没有隐忧。30 年代热河的情况实在太落后了。今天 60 多年之后，我们是否在各方面都比热河当年强得多呢？开放最早的地区，比较那个时候的承德、平泉是富得多，可是贫富分化、走私贩毒、偷税漏税、行贿受贿、卖淫嫖娼、黑恶势力危害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定和国家发展强大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此外，中国今天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必须等待在 21 世纪去解决的。

古语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们这一代人撂下问题走了 实在惭愧 谨祝下一代人走运 并以此古语自勉。

## 2. 缅甸战场

我们这老一辈的人的青年时代，是在国难中度过的。我们进大学的那天是“九一八”的前夕，毕业那天是1935年7月6日，河北全省陷入敌手。国民政府的“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中国在华北的大部分主权：取消中国在河北全省的党政机关，撤出中国在河北省的所有军队，禁止一切抗日活动。在这样的局势下，我们毕业后何去何从呢？

回想起来，在我所认识的同学中，可以概括地说，走上三条不同的道路。政治觉悟高的同学，课外谈论的话题大多是关于抗日救亡的大事，毕业后不少人到前方或敌后，参加抗日工作，也有结队到西北加入革命队伍的。另一部分同学，爱国也不后人，参加校内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但“读书救国”和“知识就是力量”的意识是他们思想的主流。他们毕业后大多按照入学时的就业愿望，到社会谋职，有当教师的，有当工商企业职员的，有当医务工作的，有当新闻记者的……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生活和工作。但是，他们其后十多年的处境证明，国家在危难中，谋求个人生活安定的愿望是一种幻想而已。还有一部分同学，大多是从南方来北平求学的。他们眼看日寇在不到四年的时

间内，侵占了从东北到华北的五个省，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北方已面目全非，还是南返为宜。我就是这些同学中的一个。但是，后来我们的境遇教育了我们：国家安全不分南北，敌人贪得无厌，应该予以反击，敌人的进犯是没有止境的。

我们分头南下，应该说是南逃。但是，无论我们逃到什么地方，敌人的轰炸机和步兵也就接踵而至。我的女友回到南京，带着老弱逃往芜湖，乘上英商怡和轮船，准备再往南逃，却被日机炸中轮船，她身受重伤。我辗转逃回广州，但敌机和步兵也跟着来。我家被夷为平地。我赤身逃到香港，正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日敌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我不得不再逃难了。到了广西参加桂林《大公报》工作，正在干得起劲儿，敌人又赶来了。1944年5月底，日军沿湘桂铁路南侵，6月中旬长沙失守，8月广西境内全州沦陷，桂林相继告急，当局下令紧急疏散，桂林《大公报》宣告停刊。这时，我的心情增添了一种与历次疏散、逃难所没有的依恋不舍的愁意。逃离被轰炸的广州时，我心中只有强烈的忿恨。逃出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时，我自责当初为什么那么没有见识，把英国看作是保护者。在桂林《大公报》，我们的生活条件很简陋，住的是木板平房，工资仅够吃米饭青菜。工作条件艰苦，夜班要等待国内外战场的最新消息，工作通宵达旦，天天如此，没有公休，白天又往往要徒步进城采访涉外新闻。遇敌机夜袭警报或是供电中断，要靠微弱的烛光看稿、写稿。遇紧急警报还要躲进放印刷机的岩洞里。在香港的生活与工作条件

好得多，但是为英美报刊、通讯社工作，尽管做了一点对外宣传中国抗战的工作，却总有寄人篱下的烦恼。在桂林，在自己的国家中工作，为中国的人民服务，我得到亲切与宽慰的感受，这是在外打工所体会不到的。

1944年8月，在欧洲、亚洲、太平洋各战场都已初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盟军6月6日在法境诺曼底登陆，8月巴黎获得解放。苏联红军已攻入德境。美国海空军在中太平洋收拾了日军各据点，逼近日本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始局部反攻，逐步收复国土。敌人在湘桂线上，虽然来势汹汹，要打通所谓从辽宁到南宁的“大陆交通线”，其实这是为了日军从东南亚撤退作准备。自从1942年秋，美国潜艇就出没台湾海峡，到1944年已完全切断了日本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军部想通过漫长的“大陆交通线”撤退部队，增援其在中国北方各战区已陷入守势的兵力。日本军部不会不懂得这是下策。即使能抽出部队驻守长达5000公里的铁路线，也无法防止神出鬼没的中国军民铁路游击队的破坏。出此下策是走投无路，垂死的挣扎。

抗战胜利曙光在望，我们多么渴望能站在西南文化中心的战时新闻工作岗位上，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还要再一次在敌人面前逃走，真够窝囊的！

桂林《大公报》停刊的前夕，在重庆总馆的总经理胡政之先生打电话来桂林馆，指示疏散职工事宜，问到我愿不愿到缅甸去当战地记者。这是突然而来的问题，我事前毫无思想准备，桂林馆同事也有点愕然，因为谁都没有听